

第三章 秦汉



第一节 社会背景

地处岭南地区的广西，是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归入秦国版图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挥师南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派大将屠睢等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战百越，发动了征服岭南的战争。战争中，秦军遭到岭南百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始皇令监御史史禄在兴安境内挖通人工运河——灵渠，并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才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征服了岭南。秦征服岭南之后，在今广东、贵州南部和广西设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然而，三郡设置后不久，秦王朝即宣告灭亡。

秦平定岭南后，南海郡龙川县县令赵佗趁陈胜、吴广起义叛秦，以及受南海郡郡尉任嚣临终委托代行郡尉职务的时机，割据岭南，自称“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自汉高帝三年（前 204 年）起，南越国开始了共传 5 世计 93 年的统治，直至南越丞相吕嘉因反对四世王赵兴内属汉朝而公开叛汉，最终于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被汉武帝所灭。据考证，南越国的北界西起广西三江、龙胜南境，经兴安严关、恭城、贺州，以及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连平、和平、蕉岭一线；东界及福建永定、平和、漳浦等地达于南海；西界为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百色、德保一线；南界沿越南北部至南海。也就是说，当时广西大部分地区归为南越国版图，其余地区则分别归于长沙国、夜郎国、毋敛国和句町国等。

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将原岭南的南海、桂林、象郡分为南海、珠崖、儋耳、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 9 个郡。交趾刺史部辖其中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 7 个郡，治所设在广信（今梧州市），后又先后移至番禺（今广州市）和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这 7 个郡中，只有郁林郡全部及苍梧、合浦郡的一部分在广西。另外，广西西北部地区属于牂牁郡，统辖于益州刺史部。现在的桂北部分地区则

属于零陵郡和武陵郡，统辖于荆州刺史部。

汉代统治岭南，推行“和辑百越”“以其故俗治”的民族政策，迁官吏及大量汉民入桂。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广西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时桂东地区出现了地主庄园经济，而合浦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促进了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这是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具体的记载，其中合浦即现在的广西合浦县。

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社会动荡，如西汉初始元年（8年）的王莽篡政，西汉天凤元年（14年）的句町诸国反叛，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的“二征起兵”（被马援平息），东汉永和二年（137年）的“象林之乱”，以及此起彼伏的苍梧、合浦等地叛乱，等等，但此时汉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汉字的统一使用，使广西在经学、自然科学上取得很大的进步，出现了经学大师陈钦（被任为“五经博士”，曾为王莽师，著《陈氏春秋》，与刘歆齐名）。此外，还有刘熙著《释名》，杨孚写成《异物志》，牟子传授佛学等。汉时，广西在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美术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第二节 美术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广西第一次纳入了秦国的版图。秦始皇征服岭南后，迁大量汉人进入广西，并实行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为广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之后虽然有南越国割据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起义，但是生产力仍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地主庄园经济，并且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还促进了与海外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秦汉时期是广西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汉代以后，青铜器的制造也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并在结合中原青铜器制造技术和造型的同时，更强调广西的地域特点，创造了广西青铜器制造和造型艺术的一个高峰。

由于秦代统治时间短暂，所以秦文化发现较少，目前的考古发现多为汉文化遗存。而汉墓的出土主要在合浦、贵港、梧州和西林等地，这是因为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当时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也非常繁荣和发达。贵港，据考证，应是当时秦桂林郡的郡治，汉武帝时改桂林郡为郁林郡和苍梧郡，贵港是郁林郡郡治。梧州作为曾经的苍梧郡广信县治，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其成为海陆的交接点，作为汉代广西地区较为发达的城市，有丰富的汉文化遗存。西林在南越国期间，属句町国的治所，出土的大量汉代时期遗物，反映了句町国杰出的文化。长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广西的美术产生了影响。如在贵港市出土的东汉俑座陶灯为裸体胡人像，胡人双腿并拢，屈膝而坐，双手抚膝，盘发，浓眉大眼，鼻梁高直，胡子连鬓，样貌奇特。该陶灯以胡人造型，体现了广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交融。而合浦出土的西汉琥珀小狮坠，也是广西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

汉代的厚葬风气和制度，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精美的汉代美术作品。从合浦、贵港、梧州、西林等地的汉墓出土文物看，西汉时期的青铜器较为发达，到了东汉时期，则转向陶器。

西汉的青铜器种类多样，常见的有器具类、动物类和人物类。稍微大型的是贵港、西林和合浦三地出土的铜马，其余均为小型青铜器。小型青铜器上多刻有纹饰图案，有写实性的人物、动物等图案，也有纯粹装饰性的几何图案。这种在铜器上篆刻图案纹饰的技术，是汉代铜器装饰工艺的一种新发展。这种技法主要发现于我国南方，其代表作品是合浦东汉悬山顶干栏式铜仓上的图案，它显示了汉代广西匠人高超的绘画和雕刻技艺。

器具类青铜器有鼎、壶、尊等，其中以温酒尊最有特点。温酒尊一般有三足，足的形象有 人物造型的，如合浦西汉人足环耳铜尊；有以传说的神兽为造型的，如梧州西汉三羊盖带纹兽足铜尊；还有以动物的足为造型的，如梧州东汉带纹熊足铜尊。

动物类青铜器除了铜马，还出土有铜牛、铜狗、铜鸟等，造型均比较写实，基本上为圆雕。此外，西林也出土有表现羊的青铜器浮雕。

人物类青铜器也比较丰富，有头像，如西林出土的镏金铜面具；有半身像，如梧州出土的东汉羽人铜灯；有全身像，这种最为常见，如贵港、西林两地随铜马出土的武士俑，西林出土的表现下棋的四个西汉铜跽坐俑和合浦的磨锄铜俑等。

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出现了一批构思巧妙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以灯具的设计最为突出，代表作品有合浦西汉铜凤灯、梧州东汉羽人灯座等。

最有时代特色的是铜仓和陶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汉时出现了手工业作坊和地主庄园经济。在出土的陪葬明器中，有数量较多的各种类型的铜仓和陶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贵港粮仓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和贵港铁路新村东汉墓出土的城堡式庄园模型是其中的代表。除了陶仓，还有陶井、陶灶等。

最有地方特色的是羊角钮钟和铜鼓。羊角钮钟和铜鼓作为南方特有的乐器，在汉代的广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贵港、西林等地均出土有羊角钮钟，其中贵港出土的羊角钮钟，上面刻有羊角形人物头像浮雕，极为珍贵。而铜鼓到了汉代已经发展成熟，出现了二类四型：滇式石寨山型、冷水冲型，粤式北流型、灵山型。其铸造和雕刻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贵港西汉翔鹭纹铜鼓和西林西汉翔鹭纹铜鼓是汉代铜鼓的经典之作。

小型工艺品的雕刻，也达到了非常精美的程度，其中贵港出土的玉杯和玉蝉，与中原地区并无二致，反映了当时广西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同步性。

在绘画上，贵港出土的绘制于桶、盘上的漆画，其写实的人物造型和抽象的几何图案造型，显示了汉代的工匠已经具备杰出的绘画表现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广西文化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其他陶器等艺术也具有特色，如梧州出土的东汉券篷双轮陶牛车，随手捏来的牛拉车，造型生动夸张，生活气息很浓，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左江流域的岩画，以花山岩画为代表。从艺术形式上来说，它应为广西现存的最早的“绘画”，约绘于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从造型角度看，富有抽象表现色彩的艺术语言，带叙事性

的情节表达，反映了广西先民对主题性绘画的高超表现力和把控力。画面人物按级别分大小，其他物象按构图和内容需要分布；人物造型、动态夸张统一，高度概括的抽象表现语言，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用朱砂作为颜料，赭色画面除了有着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还增加了一种带有宗教性的神秘色彩和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色彩，这种强烈的精神震撼力使人肃穆，生命的力量在岩壁上升腾。其中的表现情节、陈述的故事在这里已不重要，整体的艺术力量把人们引向艺术对人的生命的思考。绘画的功能以及“艺术是人类心灵、精神的表现”的定义在这里被阐述得淋漓尽致。花山岩画在人类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精神文明、艺术创造的宝贵财富。

第三节 具体美术作品

一、青铜器

1. 西汉铜凤灯。

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西汉晚期1号汉墓出土。灯高33厘米，长42厘米，宽15厘米。铜凤灯为雌雄一对，外形仿凤鸟，形态舒展优雅，姿势优美。取凤鸟形设计灯具，有祥瑞之意。造型为站立伸颈回望的凤鸟，以长尾羽后曳下垂与双足共同支撑灯的平衡。圆管形细长弯曲的颈部、扁平片状的尾部、半球体的身体、圆锥体的灯罩四个部分构成了优美的形体组合，其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姿态优雅，栩栩如生。凤背有一圆孔，放置带釜灯盘。颈内空，由两节套管相连，可以拆开和转动，还可以上下升降，调节灯光。腹腔内空，可以盛水。凤嘴衔喇叭形灯罩，罩于灯盘上方，当灯点燃时，烟灰通过凤嘴和颈部，进入凤的腹腔，溶于腹腔内的水，防止烟灰污染空气，具有环保功能。



◎西汉铜凤灯

凤鸟的全身以细线浅刻羽毛花纹，线条曲直兼施，繁简相间，非常精致优美。眼睛仅以阴线刻两圆圈，却已具神采。灯罩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为细竖线密刻一圈丝线式的装饰；上部为狮子捕羊的图案，图案的线条简练，然而动态和神态极为生动，狮子拉长的身躯，凶狠的目光，以及羊伸直脖子，痛苦和无助的眼神，均表现得淋漓尽致，称得上是绘画杰作。在铜器上篆刻花纹，是铜器装饰工艺上的一种新发展，这种技法主要发现于我国南方，尤以合浦西

汉晚期墓出土的最为普遍，代表了当地的一种发达工艺。

铜凤灯造型逼真精美，设计巧妙环保，制作精细，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观赏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是古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从审美角度看，其艺术造型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表明当时广西造型艺术的成熟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同时期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造型的灯具发现，相比而言，此凤灯造型更为灵巧和秀美。这就是不同地域审美品格的差异。

2. 西汉人足环耳铜尊。

1978年合浦县北插江盐堆1号汉墓出土，为西汉晚期的金属器，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高34厘米，口径23.5厘米。尊为圆筒形，直壁较短，两侧有兽面铺首衔环一双。上有博山顶盖，顶饰凤钮，凤形稍大，引颈翘尾，造型简洁，姿态优美。盖面低浮雕有山峰12座，其上镂空螭龙12条，还有云纹、三角纹等，线条以曲线为主，繁复而圆转流畅。器身阴文镂空菱形纹、羽毛纹、三角纹，腹腰饰凸弦纹，线条优美流畅。平底下有三个圆雕人形足，做跪地扛尊的姿势承托器身，其肩背扛尊，左膝跪地，右腿马步，左手托尊，肘支于左腿面上，右手按在右膝盖上，整个姿态非常生动。面部的神态刻画也比较传神，裹头巾，显然是下层人的打扮，额头皱纹很深，眼睛瞪大上望，颧骨下肌肉绷紧，几近痉挛状，嘴巴紧抿，一副非常吃力的样子，传神而有趣。尊的造型华丽庄重，纹饰内容丰富，雕刻手法多样，工艺精致。尊的足部以拟人化表现，姿态生动，表情传神，极富趣味，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精彩之作。

此类铜尊主要用来温酒，出土较多，除合浦外，贵港、梧州等地的汉墓亦多有出土，其形制稍有变化，如足部有人形，也有兽形；顶盖有较尖的，也有稍平的；盖钮有凤形，也多见三羊（取三阳开泰之意）。除了此件人足环耳铜尊外，1988年在合浦县红头岭3号墓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凤纹兽足铜尊与此件比较相似，也极为精美。



◎西汉人足环耳铜尊



◎西汉龙首三眼长方形铜灶

3. 西汉龙首三眼长方形铜灶。

1971年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1号汉墓，为西汉时期的金属器，陪葬物。灶身长方形，长72厘米，宽上23厘米、下27厘米，高18厘米。灶面有三个火眼，置两釜一甑。前火眼和中

火眼内置釜，大小相同。釜做圆鼓腹，口沿外折，圜底，肩饰凸弦纹一道，有双环耳。后火眼内置甑，甑口沿内敛，有两钮，腹上部有凸沿，腹内有圆鼻，做长方形孔，腹壁内收，平底。后端有龙首形烟突，是铜灶最精美之处，造型为龙头上扬，瞪目张嘴，样貌奇古，形体方整，概括凝练，不做过多细节表现，显得简洁有力，可以窥见汉代雕塑技艺的艺术水准。这种龙首形象，在汉代其他器物中也多有出现。

4. 西汉跪俑足铜盘。

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汉墓出土，为西汉时期的金属器。高8厘米，口径33.1厘米，为生活用品，是承放餐具或果品的承盘。敞口，平底，底下有三俑足。盘内中心细刻四叶纹。四叶之间刻双鹿双凤，外围两重菱形纹带，在两圈菱形纹之间饰菱形锦纹。腹内壁刻锯齿纹，口沿刻菱形回纹带。纹饰繁复，疏密相间，刻画精细，线条流畅，显得非常精美。三足做俑人状，双腿半蹲，以头和手用力将盘顶起，五官特征明显。这个铜盘圆雕与线刻并举，写实与装饰图案兼施，显示出汉代娴熟的造型技艺和生动活泼的艺术趣味。

类似的器具还有1978年在合浦县北插江盐堆1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柿蒂纹三足铜盘，其盘中的纹饰亦非常精细美观。



◎西汉跪俑足铜盘



◎西汉铜牛

5. 西汉铜牛。

2003年合浦县风门岭26号汉墓出土，公、母黄牛一对，造型写实，形体厚重。二牛均为两前腿直，两后腿弯，做站立状，两角呈圆弧状上翘，尾斜弯下垂。耳部为分铸后插上，其余各部分为二次铸成。全身遍刻象征体毛的细三角形纹。两只铜牛中，背部驼峰高高耸起的为公黄牛，其一耳缺失，鼻、嘴、眼、眉心等部位用圆圈刻画，眉毛则用细线刻画，显得较为精致；另一只牛背脊较平，无驼峰，为母黄牛，形体矮粗，腹部圆鼓，似已怀孕。黄牛在岭南常见，瓯骆人很早就养殖黄牛，用牛耕地，有崇拜牛的习俗，但铜牛雕塑并不多见，此为广西首次发现。铜牛造型在具象中又有概括处理，造型简洁，又有丰富细腻的细节和装饰表现。动物的形体结构表现准确到位，既写实又凝练，表情塑造生动传神，整体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同墓出土的还有铜马、铜狗、铜鸟和一尊磨锄铜俑等，均属于较为写实的雕塑作品，外形概括优美，结构表现明了准确，体现了汉代雕刻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其中铜鸟全身镌刻羽毛，纹饰细腻精美，形象生动，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6. 西汉人面纹羊角钮铜钟。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通高19厘米，纵径8.1厘米，横径4厘米，底宽14厘米。呈半截橄榄形，上小下大，钟顶有羊角形鑿钮，钟身上端开长方形孔，下端为平口。因钟钮呈羊角形，故被称为“羊角钮钟”。铜钟正面下方铸有人面纹浮雕，人面呈倒桃子形，头顶一对倒“八”字形外撇的弯角，形若羊角，两眼平视，双唇闭合，神态威严肃穆。



◎西汉人面纹羊角钮铜钟

羊角钮钟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乐器，在我国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和越南北部均有发现，但以广西发现最多，除贵港外，浦北、西林、容县也有出土，形制大致相同，只是钟面有的饰纹，有的素面。与商周时期流行于中原内地的铜甬钟和铜钮钟相比，羊角钮钟在形制上有明显的区别。羊角钮钟器形奇特，古朴又不乏典雅之美，浑厚中寓精巧，呈现出明显的民族风格。

左江花山岩画上有羊角钮钟的图案：在首领的带领下，伴随着敲击羊角钮钟、铜鼓等的节奏和发出的音律，祭祀人群翩翩起舞。羊角钮钟顶部的羊角形状和钟面上的人面头顶所饰的一对外撇的羊角，反映了骆越人对羊的图腾崇拜。

7. 西汉扶桑树形灯。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通高85厘米，底径20厘米。灯呈扶桑树形，主干为圆柱形，上细下粗，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从主干分三层向外伸出9条枝干，每枝顶端托一座桑叶形灯，盏心有插蜡锥。主干顶端置金鸟形灯盏。金鸟造型简洁，形体饱满，形象生动。干、枝、叶、金鸟分别铸造，用榫套扣，合成一体，可以自由装卸。枝干有长有短，上层短，下层长，上下之间互相错叠而不重复，枝干的粗端刻有“X”形符号。

整个铜灯造型精巧，垂直的主干上向外伸出的枝叶，形成对比变化，在直线与曲线、心状桑叶的造型变化中，产生一种奇特的美感，大气而优雅。



◎西汉扶桑树形灯



◎西汉漆绘铜盆

8. 西汉漆绘铜盆。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为盛水器。高13.5厘米，口径50厘米，底径44.5厘米。平口，宽沿外折，直腹，圜底。上腹部有两两对称的铺首衔环。内底有冲压时产生的辐射线，说明当时已有机手工业。通体光亮，腹内外壁和沿口均有漆彩画，沿口上饰菱形图案。腹外壁有叙事性绘画四组，每组自成一个画面，以四只铺首隔开，铺首的额、眉、眼、鼻也涂漆彩。画中有奔马、持长武器的战士、束发盘腿而坐的首领、与人搏斗的猛兽，表现出奔跑、拱立、谈话、格斗等场面。以线造型，人物形象、服饰、动作均表现到位，体现出作者娴熟的表现能力。腹内壁描绘龙、鱼和卷云，两条相互追逐的巨龙构成整个图案的主要部分，龙口中含珠，珠即铺首后面的铆钉，构思巧妙。铜盘所描绘的图画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布局得当，构思巧妙，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西汉漆绘竹节提梁铜筒

9. 西汉漆绘竹节提梁铜筒。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为盛酒器，直腹，有盖。高41.8厘米，盖径13.8厘米，底径13厘米。器足绘菱形纹，器里和底部均涂一层黑漆。上腹有铺首衔环一对，系活链提梁。器身为竹节形，分两节，以黑漆彩绘图画，分成四段，每段自成一个完整画面。画面以

单线勾勒，线条以曲线为主，有轻重变化，造型简练，只寥寥几笔，但人物的形象、服饰、动态毕现，非常生动传神，显示出画者娴熟运用以线造型的非凡的艺术表现能力。图画的内容主要是表现人物习武练气功的场景，也有说是表现方士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图景。人物之外，兼有禽兽、花木、云气等，交代了环境，并营造出紧张神秘、云舒气绕的氛围。所绘图画有一定的故事性。这件铜筒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同时还是研究当时历史情况的重要实证。

10. 西汉铜马。

1980年贵县风流岭西汉木椁墓出土。马高115.5厘米，长109厘米，背宽30厘米。雄性，体形高大，形态敦厚，肌肉丰满，四肢健壮，昂头张嘴，右前腿抬起，呈前奔嘶鸣状，尾巴曲折后翘，有一股奋勇前行的气势和一种轻松潇洒的姿态。分头、耳朵、四肢、身体、尾等9段铸造装配而成，装配接头为子母口，上有卯眼，以竹钉固定。眼、鼻、唇留有涂朱痕迹。

马的身体和四肢雕塑手法较为写实，形体塑造较为圆浑，骨骼、肌肉隐现。颈和头部则稍带装饰感，形体较方，鼻、眼等处装饰感更强，概括中带夸张，体现一种气势与力度。

马前有一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为一络须老者，戴冠，身着长袍，披甲，高鼻，深目，两眼正视，面目端庄朴实，双腿跽坐，双手半握置于胸前，应为跽坐于车上手握缰绳驾驭马车。袍甲留有涂朱痕迹。

此铜马是广西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匹铜马，出土较为完整，是少见的珍品。



◎西汉铜马



◎西汉骑俑铜马

11. 西汉骑俑铜马。

1972年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出土。由马、马鞍和骑俑三部分构成。马体壮膘肥，昂首站立，竖起双耳，张着嘴，似在嘶鸣。前腿向后微缩，后腿前靠蹬跃状，仿佛将要冲锋陷阵。马尾弯曲翘举，系单独铸造后插入臀部上方的方孔内。马背置鞍。鞍方形，两层。鞍上有一骑俑，两手平举，双目前视，双腿跨在鞍上，做勒缰状。骑俑扁平，形体概括，五官仅塑鼻孔，无其他细节。与贵港的铜马相比，此件在雕塑手法上更为统一。此外，合浦县亦有相似的铜马出土，不过体形稍小，且未见有铜俑伴随。

12. 西汉铜跽坐俑。

同时与铜六博棋盘于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出土，西汉时期金属器，四件坐俑，高

9~9.5厘米。均为男俑，戴冠，着长袍，跏坐。四俑神态、姿势各不相同：一俑左掌交举于右肩前，右掌抚膝，张嘴龇牙，似乎让人噤声；一俑右掌高举于耳际，左掌贴膝，嘴巴咧开，似乎甘心认输；一俑右掌心向上置于膝上，左掌贴膝，似做胜利的微笑；一俑双手抚膝，抬头仰天，一副极度沮丧、懊悔的样子。四俑表现的应是下完棋局时弈者的不同状态，极为形象生动。雕塑手法较为概括凝练，五官虽不做细致刻画，却能如此传神，可见其艺术表现能力高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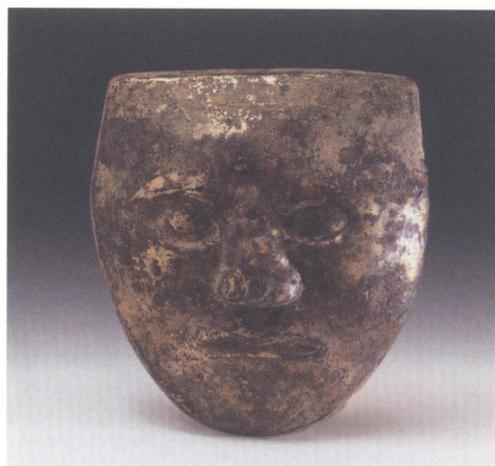
◎西汉铜跏坐俑（组图）

13. 西汉镏金山羊纹铜牌饰。

1972年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出土。共有五片，五片基本相同。其外形如鞋底，镏金，折边，周边有细小钻眼。正面是一只山羊的浮雕，山羊头顶云彩，脚踏山峰，做举头回望状，它举起右前腿，伸着长长的脖子，一副陶醉的样子，非常生动。山羊的右角非常长，向下弯曲。其脖子也很长，似乎是为了适应外形而拉长的，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幅适合纹样。该牌饰是何用途，图案有何含义，为什么是这样的外形，还有待研究。这是西汉时期少有的浮雕作品。



◎西汉镏金山羊纹铜牌饰



◎西汉镏金铜面具

14. 西汉镏金铜面具。

1972年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出土。这副面具的五官特征明显并刻画表情，其眼睛不大，较圆，眼窝稍深，鼻子短且平，嘴唇较薄，向下弯，似乎有所忧虑的样子。这件面具还对额头、眉弓和颧骨的形体起伏做了较为细腻的表现，呈现出一名青壮年结实、刚毅的脸部特征。其嘴

巴的表现，也体现了这样的特征，并且赋予了丰富的表情。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写实的头像作品。

15. 东汉悬山顶干栏式铜仓。

1990年合浦县黄泥岗1号墓出土，为东汉时期的金属器，建筑明器，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面宽58厘米，进深42厘米，通高54厘米。悬山顶干栏式，仓体呈长方形，底下有四根两节的圆柱支撑房体悬空。前后均分三格，以框突出相隔，门在正面中格，门扇单开，上有一门环。屋脊和瓦面均阴线镂刻竹节纹筒、板瓦，线条横竖、疏密相间，细腻流畅。檐口阴线刻饰半圆瓦当。

门及四壁均阴线镌刻精美图案。中间的大门右下刻一只兽面铜铺首。兽面铜铺首双眼圆凸，额头填鱼鳞纹。铺首左边是一只老鼠，上方是一只凤凰在展翅飞翔。凤凰头和身体的线条简练，但造型生动。羽毛则用线繁复，非常精美。



◎东汉悬山顶干栏式铜仓

门两边分别刻两个武士，武士面向门站立，头和身体略向前倾，头戴帽，身着宽松的长袍，脚着靴，手持长矛，腰佩短剑，似在守护仓门。武士为侧面，形象特征刻画到位，五官透视准确，用线简练，令人赞叹。此外，衣服和武器线条的长短、曲直、疏密等处理也简洁有序。武士前面各有两个身着短装、手捧稻谷、形体较小的人，他们做前行或奔跑状，线条简练，但刻画出起伏的肌肉。

背面墙中间的图案是一只老虎在追逐着一群老鼠和雀麻。老虎为猛虎下山状，回头张嘴吐出舌头，样子凶猛。两边的图案是丰收的稻穗上有一只凤凰在展翅飞翔，左右两只凤凰为背向。

侧面两壁各分两格，共有四幅图案。左壁一幅是一只乌龟驮着一盏扶桑树九枝神灯，上有神鸟环绕，龟背上有一猛兽似要爬树；另一幅似有两人在祈祷，上亦有神鸟飞翔。右壁两幅是相向的神兽在驱赶一些小动物。

铜仓图案复杂，有写实的人物，也有传说中的动物，其构图主次分明，疏密有序，线条概括，生动流畅，显示了匠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艺，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爱护粮食、渴望丰收的美好情感。铜仓是有钱人家才有的物品，而铜仓雕刻表现的题材却是普通日常生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审美上对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16. 东汉龙虎纹小铜甗。

1954年贵县新村4号墓出土，为东汉时期金属器。高7.5厘米，口径4.7厘米，底径4.8厘米。直口，带盖，平顶，上置半钮，钮上系一活链，与肩上的钮连在一起。扁圆腹，斜撇高圈足。盖面细刻柿蒂纹，盖侧面饰锯齿纹，腹上部饰网纹，中部刻有龙虎纹，足饰锯齿纹。腹部龙虎纹以阴线刻出外轮廓，线条简练，但形体表现细腻生动，各部位的姿态表现到位，很好地表现出动感和力度感。头部不做具体刻画，身体则以点状象征鳞甲。线条灵动飘逸，显示出工匠较强的以线造型能力。身体饰点状花纹，使画面有了疏密对比，富有生气和装饰美感。



◎东汉龙虎纹小铜甗



◎东汉羽人铜灯

17. 东汉羽人铜灯。

1973年梧州市大塘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现藏于梧州市博物馆。通高30.5厘米，底径12.8厘米。灯分三节，由灯座、灯柱和灯盘组成，可以离合。灯座以浮雕和阴线相结合的形式，刻三勇士各骑带翼怪兽飞跃奔腾的情景，底下衬以叶状纹图案。中间为一高鼻深目的大力士用头顶支撑上面的灯柱和灯盘，半身，双手按膝。灯柱顶端支撑着一个灯盘，灯盘圆形，直口平底。盘侧有执柄。底有三足，可独立放于桌上，亦可插于灯柱上。这盏铜灯造型优美，构思巧妙奇特，是汉代灯具的优秀作品之一。

二、铜鼓

汉代广西的铜鼓已经发展成熟，主要有石寨山型，也有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石寨山型铜鼓的特点是：鼓面宽大，大于鼓腰，胸部突出，足部变高；纹饰布局对称，丰富华丽，多为写实性纹样。鼓面太阳纹光芒与光体浑然一体，太阳纹之外是一道道宽窄不等的晕圈，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构成的花纹带，宽晕主纹为旋转飞翔的鹭鸟。胸部也饰几何纹带，主晕饰人物或龙舟竞渡的写实画像，腰部常有竖直纹带纵分成方格，内以牛或剽牛仪式和羽人跳舞图像为装饰。整面铜鼓造型优美，图案清晰，可见当时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 西汉翔鹭纹铜鼓。

1972年出土于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属石寨山型。通高52厘米，面径77.5厘米，足径90厘米。入土时胸腰已截开。鼓面中心饰太阳纹16芒，芒间填斜线三角纹。鼓面共13晕，第2、3、4晕饰勾连点纹带，第5晕饰勾连云纹，第6晕素面，第7晕（为主纹）饰20只翔鹭，第8~13晕饰勾连点纹、锯齿纹和勾连圆圈纹。胸部饰羽人划船纹6组，船两头高翘，每船各有羽人9人或11人，多戴长羽冠，其中1人跨坐船头，1人在船尾掌舵，1人高坐于靠背台上，2人执“羽仪”舞于台前，船间饰鸬鹚和鱼纹。鼓胸上部与腰下部饰点纹、锯齿纹和勾连圆圈纹。腰部分为12组，分上、下两层。上层饰鹿纹，其中2只鹿的有9组，3只鹿的有3组；下层饰羽人纹12组，每组皆2人，戴长羽冠，着羽吊巾，翩翩起舞。纹饰皆阴刻，繁简相间，写实与装饰兼施，极为精美。



◎西汉翔鹭纹铜鼓

此铜鼓所在墓为西汉时期一种葬式隆重的“二次葬”。以铜鼓作为葬具的“二次葬”墓，为广西首次发现。西林县在汉初为句町属地，汉武帝时设句町县。墓主人可能是句町的统治者。该墓部分器物带有明显的滇文化色彩，同时出土的还有铜六博棋盘和铜跽坐俑等中原汉式器物。当时还出土有铜棺，可惜已被破坏，连资料都没能留下。

另一面具有代表性的西汉翔鹭纹铜鼓，1976年出土于贵县罗泊湾汉墓，属石寨山型。通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5厘米。鼓面中心为太阳纹，12芒。芒外有7个晕圈，主晕为翔鹭衔鱼纹，并有芒纹、菱形纹、锯齿纹等。胸与腰间设4个绳纹钮，四周饰龙舟竞渡、羽人舞蹈纹等。鼓身有9个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鼓胸为6组羽人划船纹，每船6人，其中3只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另3只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鱼。鼓腰饰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3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叉开做舞蹈状，上空有衔鱼的翔鹭。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实际重30.75千克。

这种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继承与发展，鼓面较宽，铸造工艺也较精细，纹饰多样，其中有翔鹭、羽人、瘤牛、龙舟竞渡、剽牛祭祀和圆圈、锯齿等纹饰。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表现了铜鼓铸造技艺日臻完善并进入了发展阶段。

2. 西汉羽人划船纹小铜鼓。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属石寨山型。通高24.4厘米，面径29.3厘米，足径39厘米。鼓面小于鼓胸，胸部凸出，腰部收缩为圆柱形，足部扩张，大于腰，四只扁耳等距离地跨附于胸腰间。鼓面饰太阳纹（10芒）、斜线纹和栉纹；胸上部和腰下部饰栉纹；胸下部饰两组裸体羽人划船纹；腰上部由竖行栉纹带分隔成6格，格内空白；耳下方饰网纹。

该铜鼓造型端庄厚重，纹饰疏密对比强烈，装饰性图案较为繁密，羽人划船的人物图案则疏朗空灵，形成很好的艺术对比效果。



◎西汉羽人划船纹小铜鼓



◎东汉变形羽人纹铜鼓

3. 东汉变形羽人纹铜鼓。

1958年平南县上渡公社（今上渡镇）下渡水闸出土，属冷水冲型，现藏于广西民族博物馆。鼓面边沿饰有青蛙，以片状做成圆雕形式。四只大蛙（其中一只已缺）间点缀小蛙。大蛙身上有粗线浮雕纹饰，小蛙无纹，小蛙的背上各有一只更小的蛙。青蛙的造型抽象而生动。鼓面中间太阳纹12芒，芒间饰坠形纹，其余纹饰有波浪纹、复线交叉纹、羽纹、变形羽人纹、变形翔鹭纹、变形划船纹等。整面鼓纹饰繁杂，极为精美。

4.101号云雷纹大铜鼓。



◎101号云雷纹大铜鼓

汉代以后，桂东南地区流行“面阔丈余”的大铜鼓，在北流县六靖乡（今北流市六靖镇）水埔庵发现的一面铜鼓就是其中的代表。该铜鼓属北流型，通高67.5厘米，面径165厘米，足残径143.5厘米，重299千克，是迄今为止所知世界上体量最大的铜鼓，现藏于广西民族博

物馆，标号为101号云雷纹大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该铜鼓虽然体量庞大，造型却简洁，而通身饰云雷纹，又显得繁美。除云雷纹外，仅鼓面中心太阳纹和鼓身环耳突出。特别是鼓面中间的太阳纹在大片云雷纹的衬托下，犹如众星捧月，异常突出，具有极佳的艺术表现效果。鼓面中心太阳纹8芒，如朝阳凸起，光芒闪耀。芒由粗渐细，线条锐利有力。芒外有5道晕圈，宽而疏朗，各晕圈内遍施单线旋出的云纹和菱形套叠的雷纹。鼓身有14道晕圈，窄而密集，全部饰云雷纹。腰有缠丝纹环耳两对。有关此铜鼓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清代的《北流县志》中，但它最初归属谁，至今尚无法考证。铜鼓的铸造年代有说是春秋的，也有说是西汉的，亦无定论。

三、陶器

1. 东汉马座陶灯。

1999年合浦县凸鬼岭3号墓出土，为东汉时期的陶瓷明器，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灯盘口径10.2厘米，通高26.2厘米。灯座做坐兽状，蹲坐于地上，后腿前伸，前腿如手垂于后腿内侧触地，掌有趾爪。兽头如马，两眼间距较远，鼻孔朝天，口半开。马头上有弧形帽檐，身体和四肢均刻有毛发，并有一定的结构表现。灯柱由怪兽背起，上支圆形灯盘，灯盘内的枝灯已缺失，外饰一周刻画和戳印涡点纹。这件陶灯以拟人化的怪兽作为灯座，想象大胆，同时形象塑造能力高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东汉马座陶灯

与此陶灯相似的，还有1955年在贵县高中工地14号墓出土的东汉俑座陶灯，不同的是俑座陶灯为裸体胡人像。胡人双腿并拢，屈膝而坐，双手抚膝，盘发，浓眉大眼，鼻梁高直，胡子连鬓，样貌奇特。

1958年梧州市云盖山9号墓出土的虎座陶灯也与此类似。该灯座为卧虎形，老虎形象写实，贴塑出圆睁的双目、鼻子，刻有虎口和皮毛。虎背灯柱上置一圆盘灯盏，昂翘的虎尾与灯盘底部相连，形成把手。该陶灯造型古朴稚拙，设计精巧别致，融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2. 合浦悬山顶曲尺形带圈陶屋。

1989年合浦县五旗岭1号墓出土，为汉代建筑明器，应为模仿当时的建筑而塑。其塑造手法有镂空、捏塑和画线等。屋顶的砖瓦除了塑造出起伏之状，还用线条表现出细节。屋内有陶俑塑像，但较为粗糙。门口上方的窗格左为菱形，右为竖条形，门两边的墙亦塑造成两个相向的人形，并画出人的眼睛、四肢等细节，镂空不是人体的部分。其构思较为巧妙，但制作稍显粗糙。

同年在红旗岭2号墓出土的另一座陶屋，为庑殿顶式陶楼，门口两边画线阴刻两个相向的人物，头戴冠，双手持长矛，外形概括，不刻五官，但见长须飘曳，甚为生动。

陶屋出土较多，从中可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形和建筑样貌。

3. 东汉刻划五俑陶灶。

1954年出土于贵县东湖新村22号墓，为东汉时期的陶瓷明器。通高21.5厘米，长28厘米，宽18.8厘米。陶灶呈长方形，红陶质。前有火门，有一俑，跪卧火门口做看火状。后有烟囱。灶身以直线和斜线粗糙地画有纹饰。灶上三眼，分置釜、双耳锅和甑各一件，二俑在灶旁操作。陶灶左右两侧各有一缸一俑，二俑亦在操作。陶俑以泥捏成条状，造型简略，但动态仍比较生动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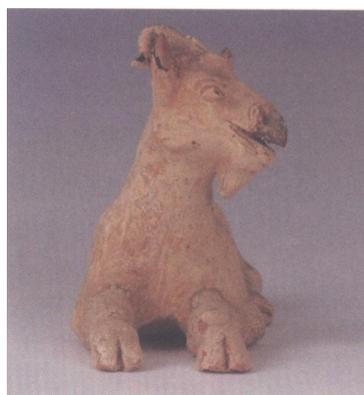
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内不仅生产各种农产品，而且饲养牲畜和经营手工业，还制酒、醋、酱、糖等食品。此陶灶五人操作，可以明显看出是一个作坊，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4. 东汉券篷双轮陶牛车。

1963年梧州市云盖山12号墓出土，呈红褐色，为硬质陶，手工捏造烧制而成。券篷车盖，两头有棱。长方形车厢，两轮。一牛拉车，做引颈伸头用力状，头较长，身体结构简略，造型粗糙，四肢的动态和结构也较为简单，显得头长身短，但神态憨态可掬。厢前坐一人，做驾车状，造型亦简略。此陶牛车，制作虽简单，但富有生活气息，真实地再现了东汉时期广西先民的生活场景。



◎东汉券篷双轮陶牛车



◎东汉陶卧羊

5. 东汉陶卧羊

1979年梧州市出土。高15.5厘米，长21厘米，宽9.5厘米。陶羊为卧姿，后肢前屈，

前肢前伸，趴地而卧。羊腿与蹄造型写实，骨骼明显，蹄前伸抓地的动态表现到位。羊伸颈抬头，向左侧，眼睛向上看，粗眉，大眼，深挖出瞳孔，显得目光炯炯有神。其耳朵直竖，嘴微张，似乎在屏息静听，形态传神生动。羊在古代代表吉祥，此尊陶羊造型写实，形象生动，表情欢乐喜庆，显示出汉代匠人杰出的形象塑造能力。

四、左江流域岩画

在广西西南地区的左江流域沿岸和附近石山的崖壁上，保存着许多岩画。据调查，左江流域共有岩画 79 个地点 178 处，分布在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大新、天等、凭祥等县市。主要部分分布总长度约 105 公里。岩画绘制时间持续 700 余年。

左江流域岩画虽然分布广泛，规模宏大，然而其内容基本相似，即在悬崖峭壁上，用赭色，以单线、粗线平涂剪影的形式表现，造型以人像为主，兼有少量的动物和铜鼓、车轮、刀剑等图像。



◎左江流域岩画（部分）

人像的基本造型有一种较固定的模式，即正面人像两手高举、两脚叉开成马步微蹲式。侧面人像两手平伸，两腿微蹲成跳跃式。整个形象如蛙形，头部无五官细节。在这种程式化的造型之下，又略有大小、尊卑、头饰、手指表现等细微区别。

左江流域岩画，是广西最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其中，宁明县花山的岩画规模最大、分布最密、保存最完整，是左江流域岩画的代表。花山岩画分别位于花山西侧和西南侧的崖壁上，共分三处，其中有一处在临江崖壁的下部，面向西南，长 221.05 米，高约 40 米，高出江面 15~110 米，有朱红色图像 1951 个，其中人物 1556 个。最大的高达 3.58 米，最小的 0.2 米。这是左江流域岩画画幅最大、图像最多最密集的一处，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幅岩画。根据画面分布、组合和所处位置的不同，自左至右可分为 19 组。

花山岩画第一处第 9 组是岩画最精华的部分。画面呈现上松下紧的布局形态。宽 7.3 米，高约 20 米。画像约 83 个，其中正身人像 20 个，侧身人像 46 个，圆形图像 10 个，动物图像 7 个。正身人像的姿态均为双手曲折上举，双腿叉开屈蹲，呈下蹲马步式形态。头、身各有三

种形态：一是圆头细颈，身体粗短。这类人像高90~100厘米，有的头有三叉形头饰或锥髻发式，手大多不画手指，有的画有三指，腰间均无刀剑，主要分布于画面下方。二是头颈不分，连成粗短的长方形，身体多细长。这类人像高100~140厘米，有的头上饰有倒“八”字形头饰，有的腰佩刀剑，有的手画三、四指，有的脚下有动物图像。这类人像在画面上下部均有。三是头颈不分，连成细长形，身体细长，腰部呈弧形内收，至胯部又渐宽，接近人体结构，显得较为具体、写实。这类人像高100~130厘米，有的头上饰有倒“八”字形头饰，个别无头饰，有的手画有三指，有的腰间挂刀。这类人像多见于画面上部。除此之外，画面左下角有一人比较特别，其高约80厘米，头呈圆圈状，上有两只角。

侧身人像集中于画面下部，上部未见。这类人像姿态大致相同，均为昂首挺胸，双手前伸上举，双腿前伸下屈。人像高50~80厘米，有的头后有垂辫，有的头上饰三叉头饰，均无佩剑，绝大部分面向左侧，少数反向。

动物图像均为侧影，多画于较大的正身人像脚下。其形态明显像狗，基本上为头右尾左，身、尾无毛刺。个别反向，身、尾有毛刺。中间的一条大狗，体型较长，嘴巴张开，两耳竖起，尾巴翘挺，四肢健步前行，生动地表现了勇猛矫健的狼狗形象。

个别正身人像旁、侧身人群中画有圆形图像，应为铜鼓，大小不一，直径多为30~50厘米。有的为纯圆形，有的内有4、6、8、9芒不等；有的芒及边，有的芒不及边；有的为实心圆，外带5、6芒；有的为空心圆，外带6芒。

画面下部，有两条弯曲的横线穿插于侧身人群之间，这是左江流域岩画其他各地点所没有的，不知表示何意。此外，在画面中部的一个细方头形正身人像左侧，有三个小圆点，构成倒“品”字形；其脚下也有两排小圆点从左向右上折，下端不封口，向上渐窄，末端有一道小横线，横线上方有一个倒“山”字形物体连接在一个小椭圆形物体下方。这种图像在左江流域岩画中极为罕见，亦不知表示何意。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左江流域岩画的作画年代、作者以及图像的内容、含义，均成谜，有待研究。

对于左江流域岩画的作画年代，主要有以下6种观点：

1. 上古或中古时期。

有人根据国内外其他地方的岩画特点分析，认为左江流域岩画也是史前所作，因为其图像表现出明显的未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特点。然而这种说法未能找出有力的依据。

2. 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

左江流域岩画上画有羊角钮钟、环首刀、有格或有首剑等图像，这些图像的实物在左江流域附近县市及其他地区均有出土，已明确断定年代。其中羊角钮钟制造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环首刀为战国至东汉时期，有格剑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晚期，扁茎短剑为战国中晚期至汉初。由此推断，左江流域岩画应为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的作品。

3. 汉武帝以前。

依据是岩画上有环首刀和铜鼓图像。环首刀在汉代广西已普遍使用，铜鼓则在汉武帝以前

就已有，由此推断左江流域岩画绘制于汉武帝以前。此外，还有人推测东汉有“二征起兵”，而这些岩画是这次起兵的遗存。

4. 唐代。

这种观点认为左江流域岩画是西原黄乾曜、黄少卿时期或黄巢起义时期所作，认为左江作为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民族首领在这里发号施令，为鼓励斗争而在悬崖上作宣传壁画。此观点以崇左市驮角山岩画旁边有两个楷书“魁”字作为依据，然而缺乏说服力，无法合理解释羊角钮钟、环首刀、铜鼓等形象出现的原因。

5. 宋代侬智高起义时期。

主要根据民间故事进行推测，缺乏依据。

6. 近代。

认为是太平天国时期或中法战争时期所作，与唐、宋两代的观点一样，然而并无依据。

以上看法，根据图像分析和科学研究，应采信第二种，即左江流域岩画成画于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

关于左江流域岩画的内容和成因，也有多种观点，主要有：

1. 符号说。

认为这些图画为象形文字，或者是从绘画向象形文字过渡时期的一种语言符号。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牵强附会，因为所有的图形均无法替换成文字内容，无对应性。

2. 巫术、图腾说。

认为是祭祀水神或生殖崇拜的遗物。根据是岩画基本出现在河道转弯水深急而险要的河边峭壁上，人们在此画像并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平安、丰收或繁衍兴旺。同时认为壮族先民崇拜青蛙，把青蛙作为图腾，人物造型模仿青蛙，是祈求丰收。此学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法解释兵器图像大量出现的原因。

3. 庆典说。

认为岩画人物众多，表现了生活各个方面，如狩猎、祭祀、舞蹈等，人像均为舞蹈之态，有的在献物，有的敲锣打鼓。画中有刀、剑、铜鼓、铜锣，还有头饰（雉鸡毛）、麾（指挥用）、藤牌等。据此认为岩画是表现人们庆祝丰收的喜悦之情，或是纪念某次大规模战争的胜利而制作。也有观点认为它是队伍集合图、点将图、誓师图、战争图。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4. 气功说。

认为岩画是壮医为防病强身创制的功夫动作图。画中人物双手上举、肘部弯曲、两腿下蹲等舞蹈动作，有舒筋活络、强壮筋骨等保健作用。岩画是古代传统壮医利用舞蹈动作导引气功防治疾病的反映。这一观点把岩画与春秋战国时期带气功铭文的玉佩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帛画并列为中国三大气功文物，认为左江流域岩画所表现的气功是壮医乾坤掌子午功。这一学说同样牵强附会，因为它无法解释兵器、铜鼓等图像的含义。同时，也无法解释这些人物形象为何会如此大量出现。

5. 纪念说。

有人根据画面造型，认为岩画中特大的巨人应是壮族古史传说中擒雷屠龙、治理洪水的英雄人物布伯，左江流域岩画即是纪念布伯而作。这一学说显得较为勉强，并无太多依据。

6. 祭祀说。

此说法强调岩画是古人的祭祀活动留下的，但是不明确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画这么多人物和图案，以及为什么这些人物和图案是按一定的样式绘制的。

我们在研究中，通过对画面的分析，认为左江流域岩画是为祭奠死去的士兵而作的。依据是左江流域岩画大多出现在河流转弯处，这里弯急水激，容易翻船，人们为了祭奠遇难者，除了在船难的地方举行祭祀仪式，向河里扔祭品之外，还在岩壁上用赭色的矿物质颜料，按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等级画上大小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全是双手向上的蛙人造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动势，是人们希望通过这些图像“招魂”，让那些溺水遇难者的灵魂得以升天。因过去船只多用于运载将士出征，所以殉难者多配有刀剑。同时，这些岩画还是他们生前生活内容的记录。另外，我们在采访当地村庄老农时，他们说这些岩画不是人画上去的，是自然显出来的“阴兵”。老农的话虽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却与祭奠遇难士兵的说法不谋而合。“阴兵”何来？我们可理解成遇难的将士。这是新出现的学说，其有力依据是2005年后不断在左江流域岩画河段打捞出来的青铜器等祭品。

以上各种观点均未有定论，而从考古新发现来判断，第六种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但也尚待进一步研讨。

在艺术风格上，左江流域岩画初看起来，似乎人物描绘简单，动作呆板机械，显得千篇一律，单调平庸。然而仔细分析，其中却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左江流域岩画在造型上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基本为平涂剪影，不描绘面目和手脚的细部，只有整体形态，造型简约概括、古拙质朴，具有庄子所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艺术表现至高境界。不断重复的蛙状人形，动作特定，有着深邃的、让人琢磨不透的寓意，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如此高度概括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反映生活的“具象”“再现”范畴，而具有“抽象”“表现”的意味，不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精神的表现。由如实反映生活的层次提升到艺术表现精神的层次，由反映现实美提升到创造艺术美，作品超越了认识的功能而具有审美的功能。

左江流域岩画看似千篇一律，简单粗糙，实则高度概括而又挥洒自如，其笔调圆润饱满，刚劲有力，粗犷传神，虽然画于悬崖上，难度较大，但画者基本上都是一笔到位，挥洒自如，富于书写性，并且人体的关节转折、动作的力度和动态的微妙变化都表现得丝丝入扣，具有生动、有趣、传神的艺术魅力。作画者不仅具有对人物形象高超的观察力，同时还具有高超的表现力。岩画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杰出的艺术创造力。

左江流域岩画在人物场景安排上交叉重叠，错落有致。这些人物虽有大小关系，但并非近大远小的时空透视关系，而是尊大卑小的关系。所有人物图像平均地、密密麻麻地布列在同一竖平面上，不受透视原理和时空关系的制约，画面也无具体环境和时空关系的交代，给人超时

空的感受。此外，平涂的人影，密密麻麻立于悬崖峭壁，动作含义深奥，让人捉摸不透，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左江流域岩画表现的无论是祭祀还是庆典，均强烈地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望、思索和赞美，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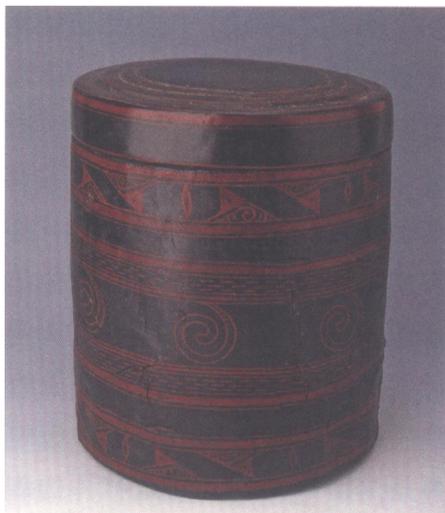
左江流域岩画是壮族先民生活与精神的艺术写照，是广西先民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弥足珍贵的艺术宝库。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五、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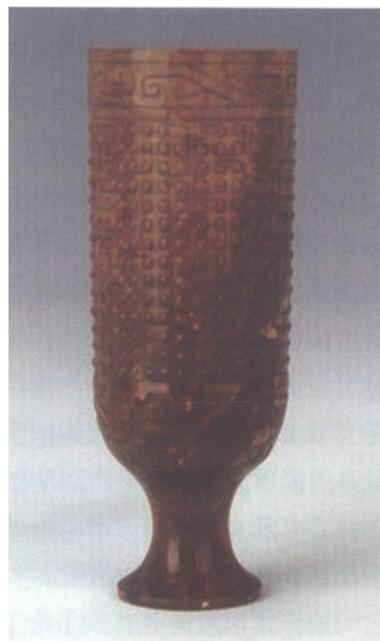
1. 西汉鱼水纹漆桶。

1976年出土于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为西汉时期的漆器。高29.3厘米，口径22.3厘米，底径24厘米。呈圆柱形，子母合口，平底。外髹黑漆，内髹红漆。盖顶为四层浅台阶式，盖边上方为一宽一窄两道朱纹，下方为一道窄朱纹。桶腹上下朱绘两道鱼纹，中间为两道水纹夹一组旋涡纹。所有纹样以二方连续延伸。鱼纹抽象概括成三角形头部，两鱼连在一起，头部左右反向，中间为竖椭圆形表示重叠。鱼外为旋涡纹。各组以平行四边形隔开。纹饰的大小、曲直、疏密相间，布置合理有序。把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形象概括成抽象的图形，说明当时匠人具有非常高超的想象力、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具象已抽象成几何图案，但仍呈现出一派泽国波光粼粼、鱼儿窜游的美丽景象，这显示了汉代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才华。

该器黑底红纹，显得古朴端庄。器形和图案与湖北出土的楚国漆器一脉相承。



◎西汉鱼水纹漆桶



◎西汉谷纹高足玉杯

2. 西汉谷纹高足玉杯。

1976年出土于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高11.3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3.3厘米。由一块黄褐色半透明的硬玉雕琢而成。与现代的高脚杯形状相似，器壁厚薄均匀，平口，直腹，圆底，下连豆把形空心座足，口沿和下腹各刻一周卷云纹，其形态方折有力，舒展自如。腹部每

两个乳钉为一组镂刻谷纹，上下左右穿插排列，密布，工整。足柄素面无纹。玉杯是一种饮酒器，其器形约始于西汉时期。此杯玉质晶莹润滑，纹饰雕刻精细，造型端庄优美，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玉杯造型、纹饰相似。

3. 西汉龙形玉饰件。

1979年出土于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长9.4厘米，宽3.1厘米。黄褐色玉质。扁圆弧形，浅浮雕兼以阴线刻龙首，做昂首张嘴状，利牙相叩，眼睛圆凸，传神地表现了龙的凶猛威严，造型简洁优美，纹饰刻画精致而恰到好处。龙身浅浮雕刻绞丝纹，线条流畅。尾部残缺。此饰件构思巧妙奇特，造型生动传神，纹饰精美，是一件玉雕精品。



◎西汉龙形玉饰件



◎西汉琥珀小狮坠

4. 西汉琥珀小狮坠。

1975年出土于合浦县堂排2号墓。长1.2厘米，高0.8厘米。深褐红色玉质。狮子做伏卧昂首状，前肢屈腿向前，后腿屈收腹下，腹部有一圆孔穿过。器形较小，造型外方内圆，制作工整，形体准确，采用“汉八刀”刀法凿刻，概括简洁，形态生动，与汉代石雕循石造型的雕刻手法一致，但造型又有西方的特征。因此，此狮坠反映了汉代广西与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

5. 东汉蝉形玉珞。

1956年出土于贵县初中宿舍2号墓。长5.7厘米，宽3.1厘米。灰白色玉质，已钙化。蝉头部略呈弧形，双眼凸出，嘴角分明，弧线形的蝉翼覆盖着蝉身，腹部刻有7道长短不一的横纹。玉珞雕刻简洁，造型优美，刀法利落舒展，形体变化丰富，耐人寻味，有着极高的艺术性。其形制和刀法与中原地区的玉蝉一致，具有明显的“汉八刀”特征，反映了汉代广西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东汉蝉形玉珞

6. 东汉滑石人面具。

该面具于1983年在柳江县白沙乡（今柳州市柳江区白沙镇）新安9号墓出土，为东汉时期作品。面具为扁平浮雕，高30.3厘米，分脸部和舌两截，舌径14.1厘米。头部所戴之帽，状如现代道公作法时所戴的帽子，有线刻和环形钻洞装饰。脸部眼珠为豆形，鼻子有鼻梁无鼻翼，颧骨部位有起伏，嘴巴张大，着重刻画出上部的牙齿，牙齿有中间大两边小的区分。下半部分为舌头，舌头硕大，几乎与脸相等，属夸张手法。舌面上有左右斜向画线各7道，组成菱形形状，交叉点有环纹，舌头中间横向上有一大两小三个洞。整件面具造型奇特，夸张手法与装饰手法并用，雕刻技法简单却能表达出清晰的意思。广西盛产滑石，历代有诸多滑石雕刻作品，此件是早期的代表。



©东汉滑石人面具